

思想人生(27)

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走好自己的路

■ 陈村富

我出身于农家，自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便与哲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了9年之后，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多次赴海外参加哲学、宗教、文化等各种学术活动，亲眼见证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地位的变化，也不断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自初中开始，我就喜欢历史。高一上学期，我从图书馆借到苏联(布)党史，从中第一次了解到唯物论、辩证法。后来又接触了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等书，对哲学中蕴含的理性、思辨愈发感兴趣。当时全国仅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它也就成了我填报志愿的首选。1955年，我如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时期正是国家吹响“向科学进军”号角的时代，“向科学进军”振奋了全国的学术界，做学问蔚然成风。外语系名教授胡稼稼为哲学系的研究生、助教和进修教师开设英文名著选读课程。虽然当时我还是一年级本科生，但系主任郑鹤同意我们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选修。这一年多的跟学也为我以后研究外国哲学史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中宣部指导安排了两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学术会议。在自然科学方面，“青岛遗传学会议”公开挑战米丘林学说，揭露李森科的伪科学，为遗传学的科学性和地位辩护，可以说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摆脱苏联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影响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从深层背景来看，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在自然科学领域探寻自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

在人文社科领域，1957年春节期间，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敢于表达自己学术思想的一次会议，更是中国哲学界集中对哲学界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奉斯大林一日丹诺夫教条主义为主导的一次挑战。在这次会议上，参与的百余名哲学工作者、历史工作者用大量史实证明，切勿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史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实施“双百方针”的一次可贵尝试，更在于它是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对于学术界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份可贵的遗产，可以启发当代乃至后世的学者要有文化担当，秉持自由思考和人格独立。为了这份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2005年，北京大学哲

提要：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我们这批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断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在世界学术之林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学系五五级同学欢聚入学五十周年时，我们决定收集、编撰这次大讨论的历史资料。2006年5月，我为此事筹集经费并在杭州召开碰面会，赵修义、张翼星两位同学从海内外收集了大量资料，并联系世纪出版集团进行出版。2012年11月，《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正式出版，这本长达677页的书是我们向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的献礼。所谓“守道”，即持守中国学者的学术之道。走中国自己的学术之路，这不仅是中国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理想，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的号召。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哲学社会科学也从一片荒芜中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9月，针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所有不同单位的目标是一个，就是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

消息传来，我意识到社会科学又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杭州大学任教时，我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它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爱智慧、尚思辨、运用抽象的逻辑概念追问宇宙、社会和人生奥秘的思维风格和学术传统，从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和近代，哲学在继承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发展哲学形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思维风格。

然而，随着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明逐步成为现代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强势文明。一方面，以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等其他文明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另一方面，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只能复制西方学者的成果，毫无自己的创新。在十多年的对外交流中，我几次听到类似的、不经意的言辞：“几本外文书就可以养活一个中国学者。”

“反者道之动”，单靠言辞上的辩驳无济于事，关键是把这种轻蔑性的话语转化为自己的钻研、创新的动力。1979年，中国社科院牵头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中外文史哲六大套多卷本，并提出了三项标准：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切忌从条条框框出发；以原始文献为本，同时要吸收近几十年来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独创。

由汪子嵩先生主持编撰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就是其中之一。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汪子嵩先生了解我对当代西亚和希腊历史的爱好，认可我在古希腊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让我也参与到《希腊哲

学史》的编撰中。我主要负责收集希腊哲学史涵盖地区的社会历史文献和历史研究成果，撰写第一卷到第四卷《绪论》中的主要部分，研究文稿中涉及的社会历史背景。

身处中国大地，如何编撰出一部可以与国际对话的《希腊哲学史》？这是我们在编撰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既要抛弃在“日丹诺夫定义”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不能把希腊哲学史只归结于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唯物主义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斗争，也不能脱离西亚、埃及、希腊等具体社会历史发展情况。

为了尽量收集大量一手、二手资料，原本本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希腊哲学史，1988年我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际考察。短短一年，胜似两三年，我不仅收集到了第二卷有关柏拉图和智者运动的材料，还找到了和第三卷、第四卷有关的珍贵资料。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我对希腊哲学、西方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从来不会崇洋媚外，也不会全面否定西方文化和古代地中海文化。中国学者或许在希腊哲学、希腊文化研究领域有滞后，但我们在语言分析、资料运用与诠释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从汪子嵩先生主持编撰《希腊哲学史》，到其出版发行，我们花了整整28年的时间。这套重达8公斤的巨著中，凝结了一代中国学者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所花费的心血。20世纪末，中国社科院原哲学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邢贲思率中国哲学界代表团参加世界哲学大会，除了携带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之外，挑选了已出版的《希腊哲学史》前两卷作为中国哲学界的献礼。据他回忆，“外国哲学界感到吃惊，中国哲学界也有人撰写这么大的《希腊哲学史》”。这部书也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一等奖。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总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如今想来，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做出的一系列探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摸索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道路。这条道路既要同苏联式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文史哲“史实”出发，吸收借鉴别国的文化成果，发展成独有且经得起国际同行挑战的创造性成果。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作为一名学者，我亲身参与、见证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七十多年

来，中国学术界在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领域取得许多重大成就，有些甚至让世人刮目相看。当这些无数的“个案”上升到“一般”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也就依稀可见。

我们反对“文化自卑”，也反对“文化自负”，持守“文化自信”。“西方中心论”曾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认为西方文明才是适应世界的“普适性”文明。虽然西方文明也是璀璨且深厚的，但是“西方中心论”制造了“西方”与“非西方”，特别是“东方”的二元对立，盲目地把欧洲或者西方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无视甚至否定其他地区人民的历史。坚定文化自信，就要纠正“西方中心论”，正确看待中华文明在繁荣世界文明中的独特作用。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内涵和外延愈发丰富。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根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标。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正是从根脉吸取养料，为实现远大目标铺平道路。在这条学术大道上，我很庆幸能做一枚铺路的石子。

上世纪80年代出国学习时，我到那不勒斯火车站提取行李，工作人员看我一副书生样，很客气地问：“您是日本人吧？”我回答“我是中国人”后，他马上换了一种语气说：“哦，那你在哪个餐馆打工？”在他眼中，中国人到意大利就是开餐馆、做皮包的。如今，我再次故地重游，一切已是新景象。正是在一批批中国学者的探索下，我们开辟学术新领域，发表独到见解，在国际学术界站稳脚跟，也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和佩服。

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同年轻人是大不一样的。我们这批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学术之路的发展，更相信有志向、继承优良传统的人文社科学者一定会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名家小传



陈村富，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历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华东分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会理事。著有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合著）、《希腊原创文化研究》等，在海内外发表了相关领域代表性论文近百篇。

■ 社科论衡

倪旭前

在东西方漫长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中国传统书法逐渐走向世界艺术之林。回望古代，中国传统书法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趣，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产生过重要影响，包括魏晋尚韵书风对日本奈良书风形成之影响，唐宋意对日本平安书法风格的塑造等。明清书法对日本江户文人书法高潮的形成以及日本书法日趋走向平民化的社会思潮影响显著，成为当时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标志，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首先，明清书风的转型与帖派书法的风格多元化，为满足日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诉求提供了条件，奠定了日本取法明清书法的审美取向与艺术基础。明清书法比起汉魏、晋唐书法虽有所衰退，然而形态纷呈、名家辈出，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在江户时代推崇儒家文化的背景下，这些明清书法作品正好符合江户文人的审美需求，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书法文化碰撞与共鸣。在明代前期，以“三宋二沈”为代表的传统派书法家，延续元代赵孟頫的复古思潮，追求笔法精妙的魏晋帖学古韵，逐渐走向结体端庄、缺乏生气的“台阁体”。这种以实用为主、带有功利性的书法审美范式固然不值得大力弘扬，然而也迎合了江户文人对于书法艺术“雅正”的审美需求，因而颇受青睐。同样，文徵明楷书、董其昌行书也因其结体的严谨、意境的雅逸而深受江户文人的追捧。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追求自我意识和个体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兴起，徐渭、王铎、张瑞图等极力突破传统笔墨束缚，热衷于通过狂草书写来宣泄人性的情感，产生了一大批高堂大轴作品，同样引起日本书法界的极大兴趣。其中，王铎的草书，笔力沉雄、章法奇绝，深受日本书法界的推崇，尤其在武士阶层文人中享有盛誉，在日本民间甚至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之说，可见王铎书法在日本的影响力。这些高堂大轴至今仍散存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书道博物馆以及一些日本民间私藏家之手。对应于高堂大轴的创作，董其昌则倡导“淡墨”，追求文人逸气，使得传统帖学风格渐趋多元，这也符合日本书家对多样化的书风的审美认同。至清代，阮元、包世臣倡导“碑学”，推崇汉碑的雄浑气象，形成了碑学与帖学并存的局面，碑学在日本，同样也得到了不少书法人的效法和追随。

其次，明清书法对江户文人书法的塑造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有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路径。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1633—1854），不过与中国还是保留了部分贸易通道，当时的长崎港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枢纽。此时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趋于稳定，町人阶层（市民阶层）开始崛起，他们推崇中国儒家，对朱熹学说乐于接受。因此，他们对于明清书法的诉求，也属于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文化思潮。明清书法对江户时代书法的传播方式是多层次的，传播路径也是双向的。其一是明清书法作品的大量输出。日本学者大庭修曾根据当时的长崎竞标买卖记录，得出江户时期有大量的中国书法作品输入日本的事实，这一点在马成芬著作《唐船法帖的研究》等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其二是书法文献也不断地输入日本，包括明代《停云馆帖》《戏鸿堂帖》，清代《三希堂法帖》《快雪堂法帖》等官方刻帖以及明清时期董其昌、文徵明、王铎、傅山等书法民间刻本，还包括被翻译成日文后得以广泛流传的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阮元《南北书谱论》《北碑南帖论》等相关理论著作，成为江户文人重要的书法学习典籍。日本文人也积极收集中国书法文献，甚至给中国文人写信交流，通过“唐通事”（中日翻译）了解中国书法的最新发展情况。其三是在中日人员往来过程中交流书法艺术。明清时期有大量的赴日学者、商人、僧侣，他们成了书法传播的主力军。如清代康熙年间，中国僧人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在弘扬黄檗宗佛教的同时，也间接传授书法笔法与审美；乾隆年间，中国商人林道荣在长崎经营贸易，为江户文人介绍碑学。这些书法传播活动，最终完成了对日本本土化的“和样书道”等艺术改造，为江户文人书法高潮的形成甚至日本近世文化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最后，江户时期对明清书法的接受逻辑也值得研究。在接受过程中，既重视模仿与借鉴，又追求创新与改造，既积极主动吸收，又能反向输出。明清书法对江户文人书法起到了主导性的塑造作用，表现在书体、审美、风格等多个书法艺术层面，江户文人吸收了明清文人“以文养书”的书法理念，重视清代碑学“重古意、尚天然”的审美取向，将本土书法风格由“精致”转向“古朴”，等等。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明清书法移植与再现，而是积极融入日本本土文化元素，通过本土化改造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书法艺术风格。如日本书法家在接受董其昌“雅逸”风格的同时，增加“温润”的本土审美特点，最终形成了“董风变体”。江户中期日本书法家市河米庵借鉴清代邓石如隶书笔法，同时又融入日本本土的“片假名”章法韵味，形成了风格独特的“米庵体”，成为江户碑学书法的代表。江户后期文人富冈铁斋，将明代徐渭的狂草、清代伊秉绶的隶书与日本的“假名书法”熔为一炉，风格独特，成为江户文人书法本土化创新的一个典型。江户时代针对明清书法的改造性吸收，反过来又启发了明清书坛对于书法风格多样化的持续追求；而日本近世书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了中国当代的“现代书法”。这种文化互鉴与共生的良性循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输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韩国世翰大学教授、博导）

■ 新书荐评

《中国学者眼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书是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韩庆祥主编、多名中国权威学者系统诠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品。全书集结了张国祚、欧阳康、姜辉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阐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世界意义等内容，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是对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题及其特征的高度理论概括。

本书集中了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精华，展现了中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貌和水平，对国内外了解、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化进程有重要参考价值，具有极高校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

实践探索

以文化+科技+入境游开拓国际形象传播新路径

■ 李远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完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入境游不再仅仅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展示大国形象、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浙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体验独特，一直是外国友人深度感受中华文化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浙江通过推动文化、科技与入境游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了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面向国际社会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接待入境游客1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2%；实现国际旅游收入18.9亿美元，同比增长26.2%。

“文化+科技+入境游”的浙江实践

为全面提升入境游服务水平，努力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和高能级开放强省，浙江坚持“文化+科技+入境游”的创新理念和方法，推动文化、科技、旅游融合发展，构建了一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化文旅服务体系。

打造数字基建。浙江率先推进以“城市大脑”为核心的文旅数字化新基建，显著提升了入境游客的便利度和满意度。2025年上半年上线的省级平台“嗨游”(Zhejiang Travel)依托AI大模型技术，为境外游客提供个性化行程规划、跨语言实时导览、跨境支付

优化“文化+科技+入境游”的方式举措

立足当前发展基础，接下来，浙江应充分发挥好文化优势、紧紧抓住数字化变革历史机遇，进一步优化完善“文化+科技+入境游”新模式，全面重塑入境旅游服务、管理、体验和传播模式，打造更多有影响力、传播力和辨识度、美誉度的文旅标志性成果，助力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全方位展示浙江形象。

一是优化技术应用场景。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入境旅游全程深度应用，开发覆盖多语种的智能客服、实时翻译、行程规划系统，破解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拓展VR/AR技术在文旅场景的创新应用，打造更多“数字孪生景区”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境外

新书推荐

《中国学者眼中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一书是由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韩庆祥主编、多名中国权威学者系统诠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品。全书集结了张国祚、欧阳康、姜辉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阐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世界意义等内容，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是对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题及其特征的高度理论概括。

本书集中了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精华，展现了中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貌和水平，对国内外了解、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化进程有重要参考价值，具有极高校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

